

新时代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的 逻辑考量与实践理路*

黄红平

【内容提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阈看，党内利益集团是党内利益群体在共同的逐利价值观下，强化自我利益认同而结成的一种非法的政治性组织，具有严重的危害性。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是苏共亡党深刻教训的警示，是全面从严治政实践提出的重大命题。抓好这一重大政治任务，务必正视现实风险，将之纳入党建目标架构；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获取有益参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夯实思想基础；深化执政党治理，密织制度之笼；聚焦政治建设，锤炼强健体魄；完善自净机制，保持高压态势。

【关键词】党内利益集团 全面从严治政 马克思主义政党

作者简介：黄红平（1978-），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南通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南通 226019）。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党内“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①。2015年10月29日，他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强调：“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②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指出，新时代要“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③。这就清楚地阐明了这一“严重隐患”的实质所向。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若是内部形成各种利益集团，不仅终会走向苏共亡党的老路，而且必将辜负历史使命。新时代如何有效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是一项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党内利益集团的生成、本质及其危害

利益集团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无论是在专制还是民主体制下，利益集团从来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不复存在。作为西方国家一个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利益集团通常是指因利益而联系在一起并且自觉意识到这些共同利益的人的组合。利益集团理论最早起源于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建设马克思主义廉洁型执政党研究”（14YJC710020）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②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31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西方政治学领域，其开创者是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随后，伴随代议制民主体制下西方社会的日益分化，不少学者对利益集团问题有许多深入研究。利益集团理论在西方的起源与繁盛容易让人产生其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关联的假象。据考证，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使用过“interest group”（利益集团）这一概念。譬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草稿）》中说，“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赘瘤，在第一个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种分工是随着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利益集团，从而为国家活动创造出新对象而扩大的”^①。立足于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贡献超越了西方学界，主要体现在：一是深入人类利益关系的本质层面认识利益集团，二是详细论证了其产生的根源及其与国家二者的关系互动。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利益集团理论为当下深刻洞悉党内利益集团问题提供了理论“显微镜”。

马克思主义政党尽管在性质上是先进的，但并不意味着其内部不会滋生改变党的性质的利益集团。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处于相同地位的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常在不经意间形成一种自在的社会利益群体。自在的利益群体是利益集团形成的物质基础，具备向利益集团转化的潜在能力和现实可能性。当其成员普遍达成利益认同，并进行自我组织化或集团化时，这就可能促成利益集团形成。尽管党内利益集团是形形色色利益集团中的一种特殊形态，但这种由自在转向自为的内生演化模式同样适用于解释党内利益集团的生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利益从本质上说就是党的利益。但是，作为党的最小的组织细胞，“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也有正常的社会交往；党员、干部要开展工作，也需要赋予一定的职权”^②，这样就形成了自身利益。毋庸讳言，在党的利益与党员利益之间有交汇也有分野。然而，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并长期执政，党内有一些人逐渐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思想倾向，他们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看成是自己的所谓‘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用来为自己捞取不合理的、非法的私利”，“他们甚至把这些东西看成谁也碰不得、动不得的私有财产，想方设法地去维护和扩大这种所谓‘既得利益’”^③。一言以蔽之，一旦自在的党内利益群体在共同的逐利价值观支配下，强化自我利益认同并且付诸行动，那么就标志着党内利益集团的生成。

利益集团是利益分化组合的结果。西方社会的发展与利益集团的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利益集团是一个中性概念，本身含义没有贬褒之分。与西方不同，在社会主义中国，利益集团带有浓厚的贬义色彩。这是因为，利益集团的生成在中国从未获得制度的支持，即其产生与发展不是通过制度化建构而是自我变异出来的，自然就不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性。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曾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关系作出客观判断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但要说明的是，这一表述实质上是从宽泛意义上讲的，主要是用来指代那些在经济利益方面具有相似或相近地位的人所构成的利益群体，并非说利益集团获得正式的制度支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和纪律规矩不允许存在剥削阶级政党及其统治集团所追求的那种既得利益，更不允许党内有任何政治派别或集团的存在，危害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从本质上说，党内利益集团是寄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政治肿瘤”，是一种恶性的政治变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形成各种利益集团，那就意味着这个党已经变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1-182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3-184页。

区别于一般社会利益集团，党内利益集团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利益的一致性。古训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共同的利益追求是凝聚党内利益集团的天然纽带，没有这一纽带，党内利益集团就无以依托。二是思想的狭隘性。党内利益集团挟一己之私，丧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维护的利益背离党的根本宗旨和立场。三是性质的非法性。在社会主义中国，无论何种形态的党内利益集团都既未获得制度的支持，又不被党的性质和政党伦理所接纳，不具有合法性和道义性。四是行为的勾结性。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和小圈子是党内利益集团形成的初始形态，相互勾结谋取私利是必然的常态。正是党内利益集团本质上的反动，决定其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具体来说，其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背叛党的性质和宗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权力乃为人民谋福祉之公器。如果党员干部借其谋私，则是对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无耻背叛，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二是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强调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优势。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就会造成党组织的涣散，从而使其失去特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三是损害党的执政基础。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党内利益集团以谋求私利作为行动指南，将公共权力私有化，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危及党的执政基础。

二、新时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的逻辑考量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国家的衰败是这样，政党的覆亡亦是如此。即使是性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随着历史方位转换和自身情况变化，仍要注意防范内部变质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重大政治任务。万千重担系于一身的政党政治运行逻辑，深刻阐明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和“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①两大科学论断的理论正确性和历史穿透力。

1. 理论考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

过去一切剥削阶级政党或政治集团囿于阶级局限性，在掌握公共权力后竭力为本阶级本集团攫取私利，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难以获得民心，从而注定走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作为剥削阶级政党或政治集团的对立面，马克思主义政党除了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特殊的政党利益。但现实生活具有复杂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后，并不能消除某些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和观念，因此马克思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永不变质，必须防范党内一些党员和干部“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③这种情况的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此种情形可能在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身上重演，他提醒全党要保持“两个务必”，警惕“糖衣炮弹”的腐蚀。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同志尖锐地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④1959年，毛泽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④ 《毛泽东年谱》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东根据当时苏联党政干部中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现象，创造性地提出“既得利益集团”的概念。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①。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深入剖析了党内存在的各种特权现象，虽然没有明确指明党内利益集团问题，但事实上已有所触及。江泽民指出，要“警惕人们所说的‘既得利益’问题”^②，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防止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内滋生利益集团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抓好抓实。

2. 历史考量：苏共亡党的深刻警示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习近平指出：“我们国家无论是在体制、制度上，还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③苏共亡党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警醒。“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二十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二百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④在苏共亡党后的近30年里，中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答案，如“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体制弊端说”“经济没搞好说”“军备竞赛说”“民族矛盾说”“舆论失控说”等。这些观点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它们的不足是仅看到问题的表相之一，未能洞察历史的真相。正如美国研究俄罗斯问题专家弗兰克·奇福德所言，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回顾历史，导致苏共亡党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从根本上说是其内部形成了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特权官僚阶层。苏共党内的特权官僚阶层肇始于斯大林时期，形成于赫鲁晓夫时期，固化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强大于戈尔巴乔夫时期。从严格意义上讲，搞垮苏共的政治力量与其说是西方敌对势力，不如说是来自其内部的“政治蛀虫”。基于严格的实证研究，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曾指出，苏共亡党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即苏共党内的特权官僚阶层成员面对的是矛盾的现实，“他们大权在握、风光显赫”，然而“又处处受到约束，禁止个人积累财富，无法保证自己的精英身份能传给后人，这都必定限制了苏联精英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独特利益的社会阶级从而加以认同的程度”^⑤。为把特权和财富传给后代，他们通过“自我政变”颠覆了苏共，在国际共运史上留下众说纷纭的谜题，其中的教训需要认真吸取。

3. 现实考量：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提出的重大命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盯“管党治党宽松软”这一党内主要矛盾，采取一系列新的举措加大管党治党力度，坚持正风肃纪、标本兼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层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党内政治生活出现许多新气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也暴露出党内存在许多严峻的现实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乐于结成利益共谋的小圈子。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当前党内有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值得高度注意，“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

① 邓力群：《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277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③ 转引自董瑛：《苏共亡党应成为全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教材》，《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④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

⑤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而“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①，甚至把所在地和分管领域当作自己无所顾忌的“独立王国”。2016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中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危害，指出在党员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②，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等党内消极政治文化。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果断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和令计划等一系列严重违纪违法重大案件，已经直接点出党内存在“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利益集团”的初始形态，这些力量“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改变党的性质”^③，亟须清除。

三、新时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的实践理路

进入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把党建设好，使之“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是办好中国所有事情的关键；然而要把党自身建好建强，根本前提是破解全面从严治党历史进程中管党治党宽松软的实践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当前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避免自身犯这一重大错误，必须把“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坚决防止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⑤的重大政治任务真正落到实处。

1. 正视现实风险，把防止利益集团形成纳入党的建设目标架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先进、宗旨崇高，是否就意味着它拥有永不变质的护身符？答案不言自明。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创业时“可以调动的资源十分有限，从高级干部到普通党员都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但“成为执政党，掌握了政权，有了调动全国人财物等资源的权力，而且权力之大、可调动的资源之多，都是未执政时无法比拟的”^⑥，“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党内一些干部是容易产生所谓‘既得利益’的思想倾向的”^⑦。历史和现实表明，相对于创业阶段，守业时防止党内滋生腐化变质的利益集团更为不易。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譬如，1948年，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⑧时至今日，尽管党的自身建设越来越好，成员也越来越多，但这一重大政治风险并未自然消退，反而随着党的建设和事业的发展，风险系数愈来愈高。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6页。

②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4页。

③ 王岐山：《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人民日报》2017年11月7日。

④ 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⑤ 赵乐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不移落实党的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人民日报》2018年2月13日。

⑥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

⑦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⑧ 《刘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3页。

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看，党内已出现各种不法利益集团的初始形态，“这些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大问题，难道还不是政治吗？还用得着闪烁其词、讳莫如深吗”，必须正视而不是回避这些“政治隐患”^①。事实上，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永不停息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将其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目标框架是史之所鉴、时之所趋、势之所为。

2. 向历史学习，为新时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提供有益参鉴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滋养现实最好的营养剂。从党90多年砥砺奋进的历史进程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从来都是彰显政党自信的表现。1956年11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如何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提出了两个方面的主张：加强教育和确定制度。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采取一些措施，要提起注意，在党内、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②。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反对和防止党政干部搞特殊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一是要求领导干部下基层蹲点调查，了解民情民意民生；二是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与基层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三是取消干部在商品供应和生活上的特权，降低工资；四是颁布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禁请客送礼和新建楼堂馆所等。不幸的是，囿于历史局限性，后来毛泽东把反对官僚主义与“以阶级斗争为纲”联系在一起，认为党内形成了一个“走资派”，并且试图以“大民主”的方式予以歼灭，结果酿成“文革”悲剧，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一是要从制度体制机制方面思考问题；二是要从厘清个人利益、遏制不当利益方面解决问题；三是要从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方面审视问题。

3. 重塑共产党人价值观，夯实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的思想基础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③苏共党内滋生特权官僚阶层，根源就在于其政党价值观的彻底崩溃。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看，忘本忘祖、违背初心、丧失共产党人价值观，是一些党员干部结成利益集团的主观因素。因此，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有效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地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④2016年10月27日，他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⑤。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要坚持共产党人价值观，不断坚定和提高政治觉悟”^⑥，唯有如此才能够在面对公与私、义与利、是与非、正与邪、苦与乐的矛盾时作出正确的选择，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①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② 刘少奇：《要防止领导人员特殊化》（1956年11月10日），《党建》1988年第11期。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1095页。

④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55页。

⑤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年第1期。

⑥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人民日报》2017年1月7日。

4. 深化执政党治理，密织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的制度之笼

大党领导大国开创伟业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经过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荡涤，中国共产党已壮大成为一个拥有8900多万党员、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党员数量远超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治党之难不亚于治国。治大国如烹小鲜，治大党何尝不是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当代中国的政治运行逻辑决定了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从狭义层面上讲，执政党治理现代化主要是指执政党自我管理的制度化。“制度是党的组织的基础，而制度化是党产生组织力量的关键”，“在现代民主政治下，提高政党的制度化水平，是聚合和积累其组织力量的重要途径”^①。在国际共运史上，苏共之所以内部滋生特权官僚阶层，中国之所以发生“文革”这样的悲剧，原因就出在执政党治理的制度化不足。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走一条依靠制度建设而非政治运动治党的新路子。他分析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②实际上，制度问题如果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难以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制度治党提高到新高度。2014年10月8日，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靠教育，更靠制度，“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如果空洞乏力，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多的制度也会流于形式”，一定“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③，密织执政党实现有效治理的制度之笼。

5. 聚焦政治建设，锤炼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的强健体魄

政治性是政党的根本属性。任何政党不论从其产生还是活动上看，都必须围绕特定的政治利益和特定的政治目标运行。有没有政治性，是判断一个组织究竟是政党还是一般社会组织的核心标准。因此，加强自身政治建设是政党保持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加注重政治建设，以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④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全党讲政治，党就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反之，则弊病丛生、人心涣散、丧失斗志，错误思想盛行。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涉及能否保持党的肌体健康的根本问题。党内出现“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和“七个有之”的怪现象，无不是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抓实抓好的原因所致。

新时代要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面统领党的建设。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坚持集中统一领导。在这一首要任务的指引下，我们要着力搞好一个实践平台的建设和一个重要抓手的落实。其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为什么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主要是一段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不认真不严肃现象比较普遍，庸俗化、随意化倾向比较突出，少数地方和单位政治生态严重恶化，甚至出现了系统

① 林尚立：《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8-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5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2页。

性、塌方式腐败”^①。因此，要以遵守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积极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其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其光荣传统、独特优势和力量所在。党的纪律有很多方面，但党的政治纪律最关键。严明党纪，首要的是严明政治纪律，“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②。二者协同，才能够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6. 完善自净机制，保持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的高压态势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精神品格，也是突出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③。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异体革命，自我革命是一种主客体相统一的互动过程，它强调刀口向内，革命主体有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性，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大无畏精神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果断切除身上的毒瘤，促进组织肌体的健康发展。新时代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到实处就必须完善党的自净机制。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要杜绝动机不纯的人混入党内，过去和现在做不到，将来也做不到，即使在入党之初是好的，谁就能保证其不会变质？全部的问题在于，是否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健的力量纯洁自己的队伍，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有450多人，其中大多数人既涉及经济问题又涉及政治问题，搞圈子腐败。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和令计划等人罔顾党性党纪，将自己视为“家长”，“把党内同志关系异化为人身依附关系，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结党营私、篡党夺权”^④。对这些党内“政治害虫”，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以坚如磐石的决心持续形成强大威慑，出现一个清除一个，真正发挥震慑和警示作用。

参考文献：

- [1] 刘彦昌：《聚焦中国的利益集团》，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
- [2] 王伟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利益问题的理论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1期。
- [3] 程恩富、詹志华：《当前我国利益集团问题分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10期。
- [4] 李坚：《“绝不允许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分析》，《理论探讨》2007年第3期。
- [5] 易森、赵磊：《让利益集团理论回归马克思主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编辑：张 桥）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8页。

②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7页。

③ 习近平：《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 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党建》2017年第3期。

④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9页。